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學術以儒學為主體，而作為一個歷史範疇，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儒學具體地表現出不同的學術形態，《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概括各代學術特色得失，甚為詳細，其言：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sup>1</sup>

所謂「學凡六變」，事實上就是儒學不同時代的樣態，其中歸納出漢、宋學的差異，《四庫全書總目》綜覽歷代論著，對於中國儒學之傳承，歷代學術之更迭，分析至為精闢。而漢學與宋學二者如何分判，「漢學」一詞，是相對於「宋學」提出，清儒標榜漢學，以矯宋學，漢、宋之分，遂為清儒言學術之重大法門，以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言：

---

<sup>1</sup> 乾隆敕纂，紀昀編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總目》（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1999年11月）卷一〈經部總敘〉，頁1-2。

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sup>2</sup>

皮氏論述漢、宋學之淵源，代表清儒普遍之觀念，然而清代本身漢學與宋學互有更迭，以致壁壘分明，漢、宋之分並非區分時代學術之分野而已，更是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同的研究趣味，也分別代表兩種經學詮釋態度的方向。

漢、宋學術在清朝初葉的更迭是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邏輯。然關於漢學與宋學在清代的發展關係，自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梁啟超先生所持的「宋明理學之反動」說，清代漢學之興，乃是針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種說法是錢穆先生針對第一種所提的修正看法，認為宋學於清代有其延續性<sup>3</sup>，清代漢學乃是承繼宋明理學而來。

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提出宋明理學反動之主張，云：

吾言「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夫宋明理學何為而招反動耶？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為循環。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則其派之內容，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其前。人類德慧智術之所以進化，胥恃此也。此在歐洲三千年學術史中，其大勢著明；我國亦不能違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則其嬗代之跡之尤易見者也。<sup>4</sup>

近人王伯祥、周振甫亦持此說，認為「明學的末流，變成束書不觀，空談性命，造成浮薄的風氣。它的反動，當然是會轉變到實事求是的路上去的」<sup>5</sup>。楊東蓀更在《中國學術史講話》中，續將梁任公的「理學反動」說，鋪陳於時代環境的政治影響，清朝政局穩定，以及屢興文字獄。而另一經濟的影響是國庫充實，因而康熙至乾隆朝，廣開博學鴻詞、書館，網羅全國積學之士，故漢學特盛。此一派說法，在學界影響甚廣。

<sup>2</sup>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藝文，1959年11月），頁35。

<sup>3</sup>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7年10月，頁1。

<sup>4</sup>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三（台北：水牛出版社，1981年6月），頁14。

<sup>5</sup>王伯祥、周振甫：《中國學術思想演進史》（《民國叢書》第二編第二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117。

然而梁啓超先生及持此說之學者，將清代學術發展，僅限於歷史現象之因果範疇而論，也就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忽略學術演進之內在脈絡，仍有其侷限。所以錢賓四先生即認為宋學在清代仍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並未淹沒在漢學潮流中，對此觀點明白表示：

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嵩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學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sup>6</sup>

又在〈自序〉中，提出分判的依據：「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sup>7</sup>而後余英時先生在《歷史與思想》一文中，提出結論，云：「並不否認清學有其創新的一面，但強調宋明理學的傳統在清代仍有其生命」<sup>8</sup>，足見宋學在清代並未消失。此外馮友蘭先生亦在《中國哲學史》中〈清代道學之繼續〉一章，討論到漢學與宋學之關係，他的見解是「漢學家之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係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也。」<sup>9</sup>，皆為有識之言。

所以余英時先生為此兩種不同說法作一結論：

這兩種看法的區別，具體地說，在前者強調清學在歷史上的創新意義，而後者則注重宋學在清代的延續性。從學術思想演變的一般過程來看，後說自較為近情理。因為不僅前一時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後一時代突然消失無蹤，而且後一時代的新思潮也必然可以在前一時代中找到它的萌芽。<sup>10</sup>

此言中揭示，欲完整呈現一代學術變遷，非僅就外在歷史環境論之，更不能脫離學術變遷的內在邏輯。正因此清代學術就整體來說，就不僅止是漢學，更不能將

<sup>6</sup>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7年10月）上冊，頁1。

<sup>7</sup>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頁1。

<sup>8</sup>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頁88。

<sup>9</sup>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4月）下冊，頁975。

<sup>10</sup>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88。

清代學術都歸於漢學，宋學於其學術演進中，是不能缺席的。然學界普遍以「考據學」為乾嘉學術之核心，其中研究之論文、篇章不勝枚舉，足見在研究清代學術之際，宋學常被忽略於外，甚為可惜。因此本文在論述清代學術脈絡之同時，嘗試同時兼顧漢學以及宋學學術之傳衍，期以呈現更為周全清晰的學術樣態。

事實上，《四庫全書總目》中客觀地歸納經學流變，劃分漢、宋學的差異，引導後人省察經學發展的方向，其立場亦是力主持平調和<sup>11</sup>。其後在學術界，學者多著墨於乾嘉學術之考據學以及漢、宋之爭的情形，忽略對清代學術做動態、歷史的研究，因而無形中掩蓋了清代學術演進的軌跡。所以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分論漢學、宋學儒者，乃是承繼《四庫全書總目》漢、宋之分更加周全的觀察，尤其關注於「家法」、「師法」的概念，撰寫出清代漢、宋學二派儒學之脈絡，自然是極具意義的結果。是故本論文以此為出發點，在清代學術中，了解漢學與宋學雙軌並行，歸納出儒學在清代學術中的脈絡及傳承，將清代學術作為一個歷史進程的分析，來進行更深密的考察。

## 第二節 研究現況

有關清代「漢宋之爭」的研究篇章不少，對於其中來龍去脈，以及當時學術環境，學者也多有詳實而精闢的討論。然而，歷來學者對漢、宋兩陣營的看法卻是多有紛歧。

有認為「漢宋之爭」兩陣營是實屬相異的，林慶彰教授在〈明代的漢宋學問題〉<sup>12</sup>一文，提出漢、宋學問題的淵源，從漢、唐開始，經宋至明末三個階段中，漢宋問題的演變更劇。而清乾嘉學者自以為承繼漢人治學精神，揄揚漢學過盛，致有章學誠、方東樹之反動，漢、宋之爭始再現另一高潮。於是，近千年的漢宋學問題，就在一正一反，一來一往的辯證過程中發展著。

王家儉〈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一文，就漢、宋學發展規律的內外兩個層面，提出：就內在而言，清代漢學由先天的漢、宋矛盾發展而來，故江藩提出「經學三壞」說；就外在而言，漢學自身主觀的門戶之見，便具有排他性。但儘管如此，漢、宋之爭表面上看來是一場學術的辯論，然而事實上仍是儒家陣營中的內部之爭，故清代漢、宋之爭，可視為儒學內部紛

<sup>11</sup>此說引自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蔣秋華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10月），頁170。

<sup>12</sup>林慶彰：〈明代的漢宋學問題〉，《東吳文史學報》，5期，1986年8月。

爭的一個延續。<sup>13</sup>

朱維錚〈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一文，就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以及方東樹《漢學商兌》三書，在清學史上造成的學派之爭，其中分述三書中，對彼此陣營的大肆批判，二者壁壘分明，正如文中所言：「漢、宋學針鋒相對，它表徵著十八世紀以來清統治者推行文化分裂政策，以駕馭學術文化界的技倆失效，也表徵著十八、九世紀之交，學界領袖阮元等調和漢、宋努力，效應適得其反。」<sup>14</sup>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則就義理學、章句學、象數學、小學等方面談漢、宋學術之異同。指出「漢人循律而治經，宋人舍律而論學，此則漢、宋學術得失之大綱也。」<sup>15</sup>故文中薈萃漢、宋之說，以類區別，稽析異同，討論得失。

張錫輝提出〈清代「漢宋之爭」的主要問題及其檢討〉<sup>16</sup>的論文，文中針對二個問題提出檢討：一是漢學派發展了新觀點、新方法，對「道」的理解不同於宋學，故提出「新義理」之說。二是漢、宋之爭不全然出於漢、宋門戶之見，而是出自不同的思考態度，不同的價值觀。張麗珠在《清代新義理學》<sup>17</sup>一書中所論及的觀點與此說法相似，書中作者認為考據與義理並非兩種絕對對立的不同型態，言考據者何嘗不言義理？言義理者何嘗不尚考據？因此提出兩派學術論爭，不應是考據與義理之爭，而是兩派在義理立場上的漢、宋對峙。二人所提出觀點是為「漢宋之爭」提出一新的思考方向。以上各家學者乃是根據漢、宋學的學術淵源、內涵作一分判，道出二者論爭之相異處。甚至晚近提出的「新義理」觀點，更為漢、宋學的議題，發展出一新視野。

其次，也有認為應漢、宋兼采者，例如：陳師逢源發表了一篇〈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sup>18</sup>的單篇論文，文中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核心，剖析清儒提出漢、宋對學的概念，二者分判的基準是「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

<sup>13</sup>王家儉：〈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清史研究論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頁73、78。

<sup>14</sup>朱維錚：〈清學史：漢學與反漢學〉，《復旦學報》，1993年第5期，頁54。

<sup>15</sup>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勞舒編《劉師培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頁111。

<sup>16</sup>張錫輝：〈清代漢宋之爭的主要問題及其檢討〉，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

<sup>17</sup>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1月）。

<sup>18</sup>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10月。

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sup>19</sup>《四庫全書總目》乃是以漢、宋學差異來說明其中特質，進而採取持平之論，提出：「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sup>20</sup>的主張，則其兼采漢、宋之立場，至為清楚。

周積明亦持相同看法，在〈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sup>21</sup>文中下此結論：「漢宋之間關係錯綜複雜，既有相互靠近、相互融合的一面，也有尖銳衝突、無可調和的一面，僅言「漢宋之爭」來盡概乾嘉時期的學術格局，無疑有欠真確。」<sup>22</sup>而對於漢、宋學術內涵上，認定為漢、宋融合和漢、宋對立並非自相矛盾，二者是融合在方法論上，即雙方在互相指責的同時，其實又不約而同地相互承認，義理和考據二者皆不可偏廢。

暴鴻昌在〈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sup>23</sup>一文，具體提出漢、宋學家之所以相互攻訐，實乃思想領域認識不同，而非門戶之爭，而有些論爭甚至僅是為反對而反對，更提出若干漢學家不僅不排斥宋學，甚至對其推崇備至，並且主張漢、宋調和。何佑森〈清代的漢宋之爭平議〉<sup>24</sup>也持相似看法，文中採用清代諸儒阮元、陳澧、朱一新、段玉裁等人見解，強調漢學、宋學未可截然分開。藉由朱一新所言，有意會通漢、宋，將漢學、宋學納入儒學正途。又徵引段玉裁之意，說明朱子小學，是修身之本；漢人小學，是一藝之末。學者讀書，不可偏於一端，必須本末兼賅。<sup>25</sup>可見前人已注意清儒確實已有兼採漢、宋的論點。

張君勸〈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sup>26</sup>文中，主要在論述清代漢、宋學爭論的起因與議題焦點，並檢討兩派意見的利弊得失。但其最終所得結論是：「吾所欲為國人告者，漢學宋學之性質，非對立而不相容，如清儒所想像焉。……蓋一國中之學術，以思想為源泉；古代之典籍，無一不出於其民族之思想；即其至神聖之文字，亦其民族之思力為之。」<sup>27</sup>認為彼此應相融合，所以主

<sup>19</sup>乾隆敕纂，紀昀編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四書類》（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1999年11月）卷35，〈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中庸章句提要〉，頁722。

<sup>20</sup>乾隆敕纂，紀昀編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四書類》卷35，〈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孟子集註、中庸章句提要〉，頁727。

<sup>21</sup>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第4期，2004年11月。

<sup>22</sup>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頁15。

<sup>23</sup>暴鴻昌：〈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1997年第2期。

<sup>24</sup>何佑森：〈清代的漢宋之爭平議〉，《文史哲學報》，27期，1978年12月。

<sup>25</sup>何佑森：〈清代的漢宋之爭平議〉，頁12-13。

<sup>26</sup>張君勸：〈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2月）第五冊。

<sup>27</sup>張君勸：〈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頁226。

張：以宋學家之工作，施諸思想，施諸義理，求吾人之宇宙觀，人生觀；以漢學家之工作，施諸文字，施諸名物，以求考古之正確，此兩者可以同時並存之明證也。更就廣義言之，則宋學、漢學，彼此乃互倚而不可互離。<sup>28</sup>所論已將漢、宋之學提昇至人生態度的指引。以上諸位學者所提出的漢、宋學兼采之說，無非是從針砭漢、宋學之弊，進一步思索如何從清代學術兩分情況下走向漢、宋調和之途。

綜觀以上各家研究成果，關於漢、宋學問題，學者們多著墨於漢學與宋學間之利弊得失。或有相異者，或有兼采者，其中論述不乏對漢學者與宋學者兩陣營，就其學行、治經觀點、治經方法作一梳理。然我們似乎還能有一些研究空間，在學者們觀照漢、宋學爭論的同時，我們於此以學術史觀點，有系統地建立起清代儒學系譜，一則可以補充歷來研究清代學術偏重「漢宋之爭」論點的不足；一則以彰顯漢學與宋學的學術價值，並進一步釐清漢學與宋學的歷史定位。事實上，此一問題仍必須回歸於清儒本身的學術觀察，以及自身的歷史定位問題，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無疑具有關鍵性的地位<sup>29</sup>。

所以本文所論述的主軸，乃是以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為範圍，嘗試了解清儒思考本身的學術定位問題。而歷來學者研究江藩所著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提出不少精闢的見解，則可供進一步的參考，略舉如下：

黃寶珠〈江藩《漢學師承記》之研究〉<sup>30</sup>一文，以系統的研究整理，提供江藩《漢學師承記》編纂體例及學術觀點，文中針對題名意涵、撰作體裁、文本結構進行分析，針對文本中人物選裁、編排進行數量統計、歸納與內容比較，了解江藩所援用史料的選擇，以及著作之觀點，歸結作者的學術史觀。此篇論文周詳細密，有助於本文有先備而具系統的了解。

李紀祥先生《道學與儒林》<sup>31</sup>一書中，其中一個章節談到〈「漢學」與「師承」：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此一論題。文中試圖穿透「近代／前近代」的二分模式，從縱向時間軸中釐清「近代」的章、梁與「前近代」的江藩之相承關係，並且揭示出無論是《清代學術史》還是《國朝漢學師承記》，都受到了《明儒學案》的影響。其次文中也比較分析了「地域／分派」與「師承／分系」兩種研究「學

<sup>28</sup>張君勳：〈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頁 227。

<sup>29</sup>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一文，即認為江藩具有嘗試建立清代學術系譜的深切意識。氏撰《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 年），頁 9-11。

<sup>30</sup>黃寶珠：〈江藩漢學師承記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7 月。

<sup>31</sup>李紀祥：《道學與儒林》（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年 10 月）。

術史」的方法類型，以及其中的利弊得失。李紀祥先生提出的此一論題，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清代學術史於方法、淵源上更深刻承繼與發展的線索。

至於大陸學者王應憲發表〈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簡論〉<sup>32</sup>與高明峰發表〈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述論〉<sup>33</sup>二文，以及陳祖武在《中國學案史》<sup>34</sup>一書中，對於《漢學師承記》的強調，三者內容皆著重在《漢學師承記》、《經師經義目錄》、《宋學淵源記》的撰述動機背景、體例特點、內容特色、學術價值及影響。而王樹民〈江藩的學術思想及漢學與宋學之爭〉<sup>35</sup>提出江藩所撰《漢學師承記》闡述清代漢學家的學術思想、著述及師承關係，條理分明。但為其家法所限，收采過於狹隘，導致漢、宋學門戶之爭的表面化，其中立場或有分歧，但以上四人的著作，有助於我們對清儒學術系譜的建立。

另外，也有與方東樹《漢學商兌》相較者，如：黃愛平〈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兼論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sup>36</sup>一文，認為《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二書的出現，既為清代中葉以來漢、宋之爭作了一個總結，同時也為其後學術發展變化顯示某種徵兆。而漢、宋學都是儒學內部的不同派別，它們的區別在於研究對象、治學途徑與方法，因此其間的對立與衝突，最終隨著形勢的變化而逐漸趨於調和。嘉道時期的漢學家或宋學家，都已覺察到各自的弊端，並且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了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試圖為自己學派補偏救弊。

尙小明〈門戶之爭，還是漢宋兼采？——析方東樹《漢學商兌》之立意〉<sup>37</sup>一文，提及《漢學師承記》系統地總結清代漢學發展歷史及研究成果，與《漢學商兌》則為宋學家批判清代漢學的經典之作。但卻認為許多研究者將江、方「漢、宋之爭」視為門戶之爭，是不正確的。《漢學商兌》的立意，在為宋儒辯護的同時，主張漢、宋兼采，首先方東樹並不全盤否定漢學，其次他並未將義理、考證分為二途，而是認為義理即存乎訓詁，義理、考證、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則一貫，離之則偏弊。<sup>38</sup>

<sup>32</sup>王應憲：〈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簡論〉，《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

<sup>33</sup>高明峰：〈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述論〉，《求索》，2005年第2期。

<sup>34</sup>陳祖武：《中國學案史》（台北：文津），1994年4月。

<sup>35</sup>王樹民：〈江藩的學術思想及漢學與宋學之爭〉，《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1999年，4月。

<sup>36</sup>黃愛平：〈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兼論清代中葉的漢宋之爭〉，《中國文化研究》，1996年第4期。

<sup>37</sup>尙小明：〈門戶之爭，還是漢宋兼采？——析方東樹《漢學商兌》之立意〉，《思想戰線》，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第27卷第1期，2001年。

<sup>38</sup>尙小明：〈門戶之爭，還是漢宋兼采？——析方東樹《漢學商兌》之立意〉，《思想戰線》，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第27卷第1期，2001年，頁140。



晚近中央研究院陳鴻森教授所撰寫的〈《漢學師承記箋釋》序〉<sup>39</sup>一文，表彰漆永祥先生《漢學師承記箋釋》<sup>40</sup>一書。序中提及本書之前由「近藤先生《漢學師承記譯注》導乎先路；漆君《漢學師承記箋釋》復旁蒐博采，兼綜眾長，其於職官地名、學者著述之大要，尤致詳焉。近藤先生所釋，間有未盡，其誤者正之……未詳考者，則詳考而補其闕。」<sup>41</sup>而陳鴻森教授亦接續作者此法，提出漆永祥先生文中闕漏之處，並以其本身之博識，舉出相關書籍篇章以資作者考證。而漆永祥先生所研究出版的《乾嘉考據學研究》<sup>42</sup>一書，頗為學界所稱述，而近來研究方向轉入於原典之箋釋，由此更凸顯出《漢學師承記》一書於清代學術之價值。上述多位學者針對江藩的兩本著作，就其文本體例結構、學術史觀、學術價值作一梳理，對後學欲研讀江氏書籍頗有助益。

綜觀上述，學界對於清代漢、宋學問題，目前研究的方向是：一是以學術史角度回溯漢、宋學之源流，探究漢、宋學術脈絡；二是就漢、宋學問題，探究其中爭論，凸顯乾嘉學者在訓詁考據方面的成就。然在學術紛擾的同時，漢、宋學之探討遲未就義理層次作出分析，晚近張麗珠教授提出的「新義理」觀點，為清代漢、宋學的議題，發展出新視野，考據需要義理之支撐，張麗珠教授已注意到此一方向，而清代學術義理應有更進一步之分析，則是吾輩所須完成之處。

尤其清代學者深具歷史意識，以及學術定位的觀點，在在影響其思辨考據之方向，而江藩嘗試建構漢學系譜之用意，至於明顯，也就有待釐清，其中包括漆永祥先生原是以研究清代考據學，為學界所稱許，近來研究方向轉為研究江藩及其著作，在2006年發表了《江藩集》<sup>43</sup>、《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sup>44</sup>、《漢學師承記箋釋》<sup>45</sup>，回歸於原典之餘，尤可見其論述旨趣。

故本文嘗試梳理此一學術風潮，從義理層次角度，觀察漢、宋學術問題，並以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本著作作一系聯，以建構出清代儒學——兼具漢學與宋學——完整的系譜架構，完成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期展現出清代儒學學術更為全面之具體脈絡。

<sup>39</sup>陳鴻森：〈《漢學師承記箋釋》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5卷第4期，2005年12月。

<sup>40</sup>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月）。

<sup>41</sup>陳鴻森：〈《漢學師承記箋釋》序〉，《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5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125。

<sup>42</sup>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12月）。

<sup>43</sup>江藩著、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2006年4月）。

<sup>44</sup>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6年4月）。

<sup>45</sup>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2006年2月）。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壹、命篇釋名

##### 一、「漢學」與「宋學」

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原本無漢、宋學術之分，有則是從清人開始，如劉師培所說，曰：

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詁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sup>46</sup>

是以「漢學」這一名詞，乃是清初學者所稱。康熙年間，毛奇齡治經力闢宋人舊說，表彰漢儒經說，始揭「漢學」、「宋學」之稱<sup>47</sup>，故「漢學」、「宋學」之名肇始於此。首先將自己從事之學術標舉為「漢學」，並且與「宋學」相對，則始於惠棟。惠棟窮究漢《易》，撰《易漢學》，唯漢是尊，唯古是信，在當時的學術界是率先揚起漢學的旗幟，對此錢大昕稱惠棟學風曰：「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彰矣。」<sup>48</sup>故方東樹亦在《漢學商兌》中提及：

顧、黃諸君，雖崇尚實學，尚未專標漢幟。專標漢幟，則自惠氏始。<sup>49</sup>

乾嘉學者遂以「漢學」相標榜，《四庫全書總目》述歷代學術流變，曰：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sup>50</sup>

<sup>46</sup>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劉師培論學論政》（上海：復旦大學，1990年8月），頁133。

<sup>47</sup>毛奇齡：《推易始末》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6。

<sup>48</sup>錢大昕：〈惠先生棟傳〉，《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選自《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頁379。

<sup>49</sup>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頁22-23。

<sup>50</sup>乾隆敕纂，紀昀編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總目》（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1999年11月）卷一〈經部總敘〉，頁1-2。

漢、宋學不僅是時代的分判，更是一學術路徑的區別。梁啓超更是論道：

元和惠棟，世傳經學……其弟子則沈彤、江聲、余蕭客最著。蕭客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推棟為斯學正統。實則棟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學術，不過門戶壁壘，由彼而立耳。<sup>51</sup>

江藩對「漢學」、「宋學」之區分，自是受其尊師——惠棟之學術路徑影響，故江藩於《宋學淵源記》中云：「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sup>52</sup>。故此可知自《四庫全書總目》、《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之後，「漢學」、「宋學」之名實已確立。

## 二、「師承」與「淵源」

漢儒有所謂師法、家法之學，秦火之後，直至漢初，經籍殘闕，諸生口授心傳，各守一師之法，此為師法盛行之故，師法之下，又有家法。清人皮錫瑞曾論道：「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授，一字母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師法之嚴如此。」<sup>53</sup>清儒同樣重視師法，尤以惠棟曾推許唐人疏義，保留漢學師傳之義：

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用偽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漢魏南北朝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sup>54</sup>

漢儒這種重師法、守家法的傳統，普遍為乾嘉學者所接受，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也特別留意漢代的治經傳統，其曰：

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

<sup>51</sup>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合刊）十（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頁30。

<sup>52</sup>江藩：《宋學淵源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卷上，頁3。

<sup>53</sup>皮錫瑞：《經學歷史》三〈經學昌明時代〉，（台北：藝文出版社，1959年11月），頁28-29。

<sup>54</sup>惠棟：《松崖文鈔》卷二，〈北宋本《禮記正義》跋〉，《叢書集成續編》第19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年），頁52。

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

55

阮元論江藩《漢學師承記》的宗旨，曰：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群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元居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sup>56</sup>

此番話道出江藩書名中的「師承」有兩層意義：一是遠紹漢儒家法之學，即「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二是敘述清儒傳授治學的內涵；即「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

然而江藩在為《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立名時，漢學的系譜以「師承」表現；而宋學的系譜則以「淵源」強調。就兩者形式而言，《宋學淵源記》中的「道統」，是以心傳為縱向式的系譜；而《漢學師承記》的「傳經」以師說家法為軸，也同樣是以縱向時間傳承模式呈現。二者的詞義關係似透露出對立的一面，卻也有其相似之處，江藩自詡為正統的漢學家，固然是持反宋學立場，但於此分別漢、宋，又隱然有統合分歧之意。李紀祥先生對於二者之關係，有以下的解析：

江藩的「師承」一詞，在進入其書名時，雖有著在「內容」上反宋學、反心傳、反道統的一面，但在「形式」上，「漢學」其實正與其所反對的「宋學」一般，都是以「縱向傳承」為立軸之本，兩者其實是同一類型的「分系」模式。這種「同型」並不偶然，如果我們能夠在「宋學反漢」與「漢學反宋」的現象中，看出在對立的「漢學」與「宋學」之根源處還有著一個三代聖人之學為其所共宗，那麼對於何以漢學與宋學、儒林與道學，對立的兩者皆以「縱向性」立軸為其表型特徵，也就可以了然。<sup>57</sup>

<sup>55</sup>乾隆敕纂，紀昀編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總目》經部卷七〈五經總義類經稗〉，頁1。

<sup>56</sup>江藩：《漢學師承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序〉，頁1。

<sup>57</sup>李紀祥：〈「漢學」與「師承」：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研究〉，《道學與儒林》（台北：唐山，2004年10月），頁486-487。

李氏所言，江藩其實是有意為其漢學家建立歷史傳承正統的位置，而且由於惠氏師訓之言，為宋學立傳，形成漢、宋兩分情形。在書名命名時，將漢學家標幟的師法、家法傳統，以「師承」二字概括之，所謂「師承」是以師傳經，溯自漢世博士學官的儒家體系；而宋學家以「淵源」命之，「淵源」二字取自朱熹《伊洛淵源錄》，乃是宋學道統相繼的表徵，於是聖賢脈絡與精神的追求，兩者各有其不同的學術內涵，也各自呈現漢、宋不同的傳衍形式與特質。

## 貳、研究範圍

早在清代乾隆朝，學者已經開始為建立清代學術系譜而努力，《四庫全書總目》對清代漢學淵源的尋證<sup>58</sup>，乃是乾隆朝學者在這方面努力的具體成果之一。當然更多成果出現在嘉道時期，嘉慶十四年，陳壽祺任國史館總纂，創編國史「儒林」、「文苑」<sup>59</sup>兩傳，揭開了嘉道學者總結清代學術的序幕。第二年，阮元入國史館，開始纂輯《儒林傳》<sup>60</sup>，同年江藩開始撰寫他的《漢學師承記》<sup>61</sup>，該書的主旨就是表彰清代的漢學，建立清代的學術系譜，他在書中指出：

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sup>62</sup>

《漢學師承記》的纂輯，就是為了表彰漢學，作為將來纂修國史的依據，無怪乎王汎森先生在〈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一文，認為江藩這部書是第一次系統建立清代經學系譜的嘗試<sup>63</sup>。

<sup>58</sup>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台灣大學文史叢刊》（台北：台大文學院，1998年），頁47-48。

<sup>59</sup>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石家莊：河北人民，2005年1月），頁708。

<sup>60</sup>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頁709。

<sup>61</sup>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頁712。

<sup>62</sup>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一序，頁4。

<sup>63</sup>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年），頁9-11。

阮元也在〈序〉中，言：「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sup>64</sup>，而伍崇曜在〈跋〉中亦稱美說：「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絕不可少之書。」<sup>65</sup>又如李紀祥在《道學與儒林》一書中之觀察：「江藩已經以一種為自我所置身的歷史視野而出發，對清——『國朝』以來的一種不同於前代的『學術思潮』，作了一種有定見的回顧與建構，這個建構以他所定名為『漢學』發展為主軸，並以此為準則而選人入傳，由此而塑造了一個專屬於這個『學術思潮』的『歷史圖像』，樹立起漢幟。」<sup>66</sup>江藩對漢學系譜之建構，可謂已臻於成熟，並且成為一重要參考文獻，因此繼《漢學師承記》之後，江藩又撰《宋學淵源記》<sup>67</sup>，於道光二年在廣東刊行，其編纂體例與《漢學師承記》相同，書中本惠士奇「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sup>68</sup>之教，而描述清代宋學之淵源，其意義固有補足《漢學師承記》之意。

江氏所撰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有單獨刊行與合刊本，本文採用台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刊行的單行本《漢學師承記》，其後附錄〈經師經義目錄〉，以及單行本《宋學淵源記》，二書成書相距雖已達十一年之久，但仍可合併論之。

《漢學師承記》以紀傳體史籍之〈儒林傳〉為圭臬，傳文有八卷，卷中又分主記、附記人物，並在若干傳文中，附述當時相關人物。全書主記有四十人，附記十七人，共計五十七人，至於傳文中附述所及之人物有六十三人，全書共計有一百二十人<sup>69</sup>。上起清初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下迄嘉慶間的阮元、焦循、劉逢祿，一代經師皆收錄其中。全書大致以傳主時代為序，取閻若璩、胡渭、張爾歧、馬驢為卷首，以顯示清代漢學溯源於清初諸儒。繼之以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祖孫及余蕭客、江聲等人，意在說明學術宗主之所在。卷三以下，依次著錄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江永、戴震、汪中、凌廷堪等乾嘉時代諸位經學大師。一代經學源流，依據諸家傳記匯編而得其脈絡。然而唯有清初學術大師黃宗羲、顧炎武及算學家陳厚耀屬安排頗為特別。陳厚耀為康熙時人，書中

<sup>64</sup>江藩：《漢學師承記》〈序〉，頁1。

<sup>65</sup>江藩：《漢學師承記》〈跋〉，頁151-152。

<sup>66</sup>李紀祥：《道學與儒林》（台北：唐山，2004年10月），頁442。

<sup>67</sup>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術編年》（石家莊：河北人民，2005年1月），頁821。

<sup>68</sup>江藩：《宋學淵源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卷上序〉，頁2。

<sup>69</sup>本文所計總人數120人與漆永祥在《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中119人、黃寶珠〈江藩漢學師承記之研究〉119人有明顯不同。漆氏文中遺漏卷四中童鈺一人；而黃氏文中遺漏卷一中閻詠一人，故二人文中各遺漏一人，以致總人數有所誤差，詳參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編纂諸題考實》，《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頁268-269及與黃寶珠：〈江藩漢學師承記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頁86、256。

將之編入卷七，與乾嘉大師同卷。而開一代學術風氣的黃宗羲、顧炎武，則列在卷八為全書殿後，皆屬編纂。<sup>70</sup>至於〈經師經義目錄〉以《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樂》為序，以漢學為依歸，將一代經師主要著述匯集，著錄標準甚嚴，則又是存錄清代漢學研經成果主要的依據。

《宋學淵源記》編纂體例與《漢學師承記》相同，皆為人物傳記匯編。全書以地域為分類，卷上集中於孫奇逢、刁包以下諸北方宋學家，卷下則專記劉灼、張履祥等南方宋學者。卷末所收多為儒、佛互證之學者，有沈國模、史孝咸、薛起鳳、汪縉等。

二書內容出於江藩之編排，深具主觀意識，本文參考江藩書中儒學的基本架構，嘗試從歷史意識的角度，就義理層次，以探究漢、宋學之分，藉此呈現清代儒學本身的學術定位問題。至於諸儒有關訓詁、考據、名物等論述，歷來學者討論已多，茲不贅述，以免焦點模糊。筆者將就義理角度，反映清代儒者本身的經學史觀，以及學術定位，以呈現清代儒學更深刻的學術脈絡。

### 參、研究方法與進路

所謂「系譜」(Genealogy)也者，始從西方十九世紀的學理而來。系譜，原義是指記錄關於家族世系、血統關係和重要人物事蹟，有助於人們辨明人物的身分、認識事物的特徵，和理解事物的起源，及其演變過程。<sup>71</sup>1887年尼采寫了《論道德的譜系》一書，在這一著作中，尼采首次使用「系譜」一詞來分析道德問題。尼采的系譜學思想，後來被傅柯所繼承，1971年傅柯寫了《尼采·系譜學·歷史》一文，更為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作為方法論的系譜學，不久將其運用於對權力和知識的文化分析。

今日「系譜」的定義是指追溯研究對象，論述如何建構和評估這些對象，而產生的一個論述形構<sup>72</sup>。隨著尼采、傅柯的系譜學方法分析，此一方法論便拓展

<sup>70</sup>陳祖武：《中國學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4月)，頁221-222。

<sup>71</sup>整理自《大英百科全書線上(台灣)繁體中文版》(<http://wordpedia.tb.com/>)中「系譜」條文及「系譜學」條文內容。

<sup>72</sup>彼得·布魯克作，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2004年4月二版)云：「系譜這個詞和傅柯晚期的著作有關，尤其是《規訓與懲罰》(1977)有關知識和權力關係的研究。系譜學辨認歷史過程的複雜狀態，並指出了『不連續、不正當的知識』，對抗著穩定當代社會的『核心化權力』。……系譜學追溯研究對象是如何指認出來的；其次，論述如何建構和評估這些對象；以及第三，這個過程如何產生一般命題，並部署來支持特定的論述形構。……因此，系譜學分析將嘗試揭露文化形式和權力關係之間形成這種連結的過程。」，頁170。

到各領域甚至文學，前輩學者王泛森先生撰《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sup>73</sup>，即以「系譜」來描述學術發展的脈絡。筆者不敏，師法於此，亦以「系譜之建構」為名，嘗試江藩在治經工作之餘，進一步釐清清儒本身的學術思惟與自我定位，期以呈現其饒富歷史脈絡之思惟。

故本文將此系譜學的方法，運用於學術史的論述上，作為思考學術脈絡的研究，追溯儒學的傳承。藉由系譜觀點，有助於了解清儒之脈絡，與傳承世系之關係，再者更可凸顯出，每一位經師之地位卓然而起，又可見其師承與影響，以期產生一清代儒學之完整架構。

歷經明清更迭的社會動盪後，清代學術循著學術演進的趨勢，逐步發展。清初學術上承宋明遺脈，下啓清學新路，在此學術涵養的氛圍中，蘊釀出燦美的乾嘉時代，以致清代的博學鴻儒，能為中國學術立下完美的整理佳績。因此本文擬由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的閱讀，以觀察者的角度，藉由書中收錄的漢學家及宋學家，從中梳理江藩心中關注之漢、宋學者的人物學行、治學理念、對儒學的承繼，乃至對學術的歷史使命感，二者交相比對，以建構出清代儒學的系譜架構。

其實仔細分析江藩書中的結構，可以了解他受到《明儒學案》的影響，在以「發展」及「年序」為主的書中架構，卷次安排，以學術的前期承繼為卷首。《漢學師承記》以閻若璩、張弢等人為先，而《宋學淵源記》以孫奇逢為首。故清代學術承襲明末，未能斷代而論，而欲明瞭清代學術背景，必先了解明清之際的學術環境，方能對學術之傳承有一完整概念。本文既以漢、宋學作為清代儒學的觀察重心，勢必對當時學術界充斥的漢、宋對壘有所觀察，以明其源由及對立之消長。

出生於乾隆時期的江藩，年幼之時，清廷已開四庫館，十五歲以後，得蘇州名儒余蕭客、江聲引導，步入了經史考據之學——漢學的門牆。江藩終身未仕，但曾被延攬於阮元等幕府之下，《漢學師承記》更是受其資助而刊行。其成書之背景，自當是觀察之基礎。而《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二書之架構以紀傳體史籍之〈儒林傳〉為依歸，各自將漢學家與宋學家之師承及淵源，依其源流，匯編而得其脈絡。故本文將此二書載錄之師承、交遊、家傳關係，作一清晰、條理之梳理，呈現其學術系譜。

在江藩建構系譜的觀念中，最受到關切的應是二書中——儒者的人文精神及

<sup>73</sup>王泛森撰：《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6月）。



學術思想之脈絡。江藩在書中，每論及一位儒者，必交代其學術淵源，或為家學，或為師學，或為交遊對象，作為學術傳承之系聯。又述及人物之學行事蹟，或為家世背景，或為仕宦之途，用意在於形塑其後對自身學術之影響。在儒者對孔門之看法上，或以孔門之學自居，或以各自之師承為宗。在對於學術之歷史使命感上，或以學行表之，或以著述表之，然而關懷所在，於此得見。

至於學術思想之脈絡上，關切的論題在儒者的治學理念，以《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書中所論及之處，或為家學淵源之影響，或為師學淵源之影響，或為交相問難之影響。在儒者的經學觀點上，或博通經史，或精於小學，或好金石、地理、春秋……等，由於學術成就不同，治經方式自有差異。在學術地位之認同點上，或為堅守捍衛各自學術之立場，或為站在學術對立之立場大肆抨擊。在儒者對儒學之承繼與發揚上，或為家傳、師學之故而承繼衣鉢、遺命，或為自身在儒學領域之深研而成就，然其呈現之多元與複雜，正顯現清儒學術豐富之樣態，也正是本文嘗試釐清之處。

在此思想體系的脈絡上，本文將從江藩的論述中，以觀察者的角度，在儒者的人文精神及學術思想的不同面向，梳理出漢學領域與宋學領域二者表現之異同，以期歸結出清代儒學傳承之完整體系脈絡。

最後反思並檢討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二書一出，對當時時代的影響，尤以《漢學師承記》一問世，招來宋學家的反擊，以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最為有力。可見江藩建構系譜概念，對清代學術影響不容小覷，江藩本人以純漢學家自居，在當時漢學與宋學壁壘分明之下，標舉漢幟，排斥宋學。而在此堅壁清野的觀念下，《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二書中，學者的編排及選入，充斥著江藩個人的主觀意識，這便是其書之侷限處，也是本文可以更深一層提出檢討的地方。

儒學發展到清代，可謂綜整前代，蓄積既廣，但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清代學術較少被關注其儒學發展的流變，實為可惜。因此本論文以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為主軸，參酌目前可蒐羅的資料，在前人的努力之上，希望能呈現出清代儒學發展的架構，循著學術流變的線索，切入清代學者宗主漢學與宋學的背景，希望有助於釐清其中二者之內涵，藉以提供理解清代經學發展重要的環節。

